

年鉴评价的视角与方位

牟国义*

摘要 “年鉴”在西方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统计年鉴的影响,由政府主持编纂的年鉴走上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编纂发展道路。当代地方综合年鉴评价,应当本着历史眼光、辩证方法和科学态度,从本土视域出发,把握年鉴编纂的本土性、形态的多样性、内容的时代性、体制的创新性特点,传承、反映和呈现本土文化特性,坚持创新引领,注重内容价值,年鉴发展才有坚实的根基、蓬勃的活力和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 年鉴质量 年鉴评价 年鉴史

年鉴评价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年鉴评价的基本功能,在于发现年鉴的不凡之处,建构年鉴编纂的典型样本,揭示年鉴内容的当代价值,引领年鉴事业的创新发展。年鉴评价既牵涉到评价主体对年鉴的认知问题,又涉及到对评价客体的价值评判问题。因此,相对于评价标准而言,评价视角和评价方位的选择,就具有更为基础、更为本质的意义。

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年鉴事业蓬勃发展,年鉴评价一直被人们所关注,有关精品年鉴编纂出版的话题也在持续升温。审视近 40 年来年鉴研究进展,可以发现,由于受传统编纂模式和思维定式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年鉴发展背景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梳理,一些广为流行的观点,在评价角度、评价立场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年鉴评价缺乏历史眼光、辩证方法和科学态度,呈现出浓厚的工具书评价倾向,年鉴的内在价值评价被简单化、表面化、实用化,与中国年鉴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当下语境渐行渐远。从本土视域出发,把握年鉴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构建年鉴评价的正确导向,对年鉴事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一、年鉴编纂的本土性问题

任何事物从域外传入“本土”,都面临一个如何适应本土文化环境以及本土文化如何借鉴吸收的问题。所谓年鉴的本土性,是指源于西方的这种文本编纂形式,在进入中国特定的历

* 牟国义,男,四川省长宁县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江苏年鉴》主编、《江苏地方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史、年鉴学。

史环境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互动表现出来的有别于西方年鉴的编纂特质和文化个性,本土性是年鉴本土化过程的形态呈现和客观结果。本土化和本土性,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年鉴对中国本土的文化适应,另一方面又蕴含了中国本土文化本身对西方年鉴的价值判断和路径选择。年鉴评价是否立足本土,是否传承、反映和呈现本土文化特性,是年鉴发展的重要前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年鉴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问题,曾引起辞书界和年鉴界的注意。在年鉴编纂起步之初,有学者指出:“我国年鉴的编纂,除了与世界各国年鉴编纂有相同的地方外,还有一个怎样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走中国化道路的问题”,“年鉴的本质和核心是一个‘鉴’字。只有抓住‘鉴’才能使年鉴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①20世纪90年代后,有专家从中国年鉴自身的定位和编纂实际出发,认为“年鉴自由域外进入中国就与中国的史、志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近当代的‘中国年鉴’,通体上下浸润着中国史志的血脉和气韵”,“‘年鉴’必须做‘中国式’的理解”。^②遗憾的是,对年鉴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未能深入开展下去,这些富有创见的声音,常常被占据主导地位、带有一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观点所淹没。时至今日,年鉴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谈到年鉴,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其外来性,审视当今中国年鉴发展,每每以西方年鉴特别是西方流行的大众年鉴作为参照,用西方年鉴的定位、编纂模式和技术标准来进行衡量和比较,甚至对一些西方畅销年鉴推崇备至,而对中国年鉴的演变发展、自身特征和编纂传统,大多采取忽视、遗忘、回避甚至拒绝、排斥的态度。年鉴的中国文化身份及本土经验一直处于被悬置的状态,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化”的缺失。

年鉴中国化是与近代西学本土化密切关联的客观历史进程。西方年鉴从概念和文本输入之日起,已经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环境,显示出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特征。1823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编纂出版的《华英字典》中首次收录“Almanac”一词,这位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采用了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通俗易懂的“通书、时宪书、大皇历”进行对译。19世纪40年代以后,一批西方传教士和在华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仿效当时西方年鉴编纂的《华英和合通书》《平安通书》《博物通书》《上海通书及杂记》《中西通书》等类型的书籍,^③在当时的中文报刊中无不以“通书”面目出现。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Almanac”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书、通书的某些相似性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历书、通书在民间的普及和广泛程度,可以看作是在华西方人对年鉴的中国式解读。意味深长的是,西方视野中这类融指南性、知识性为一体的“通书”,在中国民间仍然按照自己的轨迹继续扩散,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西方年鉴的引进、接受和认知有着完全不同于“通书”的选择和理解。

① 杨希祖:《年鉴编纂的总体设计》,《辞书研究》1984年第4期。

② 王相钦、周斌:《年鉴的中国式理解及其流派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1993年第4期。

③ 1843年,由美国传教士波乃耶编辑的《华番和合通书》首先在香港出版,后在广州、澳门等地出版。该书书名几经变化,一直出版到1855年,被认为是外国人在中国编纂的最早的年鉴。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重新印刷出版了北华捷报馆编辑的1854年版年鉴(Shand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ny),书名译为《上海年鉴及杂记(1854)》。联系西方语境中“Almanac”的概念以及近代报刊的普遍认识,笔者认为该书翻译成《上海通书及杂记(1854)》似乎更切合当时的语境。

187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经林乐知口译、郑昌棫笔述,将1873年版《英国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以《列国岁计政要》名义刊刻出版,“齐州之士宝焉”^①。这是西方统计年鉴第一次被完整译介到中国。^②西方统计类年鉴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上被上升到了资政的层面。戊戌变法时期,《列国岁计政要》再次被翻译引进,梁启超称之为“国史之良”,清末预备立宪受西方统计思想的影响视统计年鉴为“古史之一体”。进入民国,年鉴尽管在书籍分类上被归入工具书或参考书范畴,但政界、知识界和思想界更多认同的是其“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的“鉴”的功能,把年鉴当作“以存史实”的“史料”“史乘”或“一年之史”“年史”去对待。1937年,被称为燕园第一位哈佛博士的史学家齐思和在《美国史书目举要》一文中,介绍了研究美国史所应参考的通史、分期史、地方史、专史、传记和参考书等六个方面的书籍,其中专门将年鉴列为“参考书”的一种类型,指出《美国年鉴》[The American Year Book (1910 - 1919; 1925 -)]“其体裁实系一年之史,于史家尤为有用”。^③20世纪40年代,有人从文献史料的角度,对年鉴编制的本土内涵进行了经典阐释和概括:“年鉴为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史料,其与一般性史料之差异处,则在于年鉴系有时间性(一年)的与地域性(一地方)的史料整体。因是之故,年鉴之编制,于其‘存史’之意义外,尚有‘致用’之意义在焉。”^④在这一时期,无论源流认知、编纂宗旨、组织模式、编述内容及其形式,中国年鉴都表现出有别于西方的特点。

因此,提出年鉴的本土性问题,首先是要对年鉴的“本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年鉴的“本来”,应当理解为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年鉴起源于西方,另一层含义是年鉴在中国已经有近两百年的演变发展历史,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与传统的史家文化不断融合,承载、包含了本土精神和文化内涵。只了解西方年鉴,无视本土化传播发展,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否定年鉴编纂的中国传统无异于否定中国年鉴的发展历史。其次,正因为中国年鉴之“鉴”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不同于西方年鉴的含义,具有了“史”或“史料”的性质和成分,年鉴评价理应回归本土,从中国实际出发,彰显自身内涵和价值维度,除了在外在层面把它当作工具书看待、用工具书的普遍属性去评判之外,还应当深入探究年鉴编纂所蕴含的“史识”观念,以及“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勘存勘鉴之记述”的价值目标和内在意义。脱离具体国情,过分强调或完全套用工具书评判标准尤其是辞书类工具书标准去评价当代年鉴,势必泯灭年鉴的个性,淡化和削弱年鉴的功能,把年鉴编纂引向脱离自身实际的路径。中国年鉴发展的方向,归根结底,还是要思考和探索如何走中国特色的年鉴发展道路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年鉴“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更需要关注自己的历史经验”,“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多回望历史,将有所裨益”。^⑤

①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1897年第33期。

② 关于《列国岁计政要》一书,笔者将专文讨论。

③ 齐思和:《美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1937年第2卷第4期。

④ 张绚:《略论年鉴之编订》,《安徽文献》1948年第4卷第5期。

⑤ 方书生:《近代中国年鉴的特征与启示》,《2017年地方志与地方史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汇编》,2017年9月,上海。

二、年鉴形态的多样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鉴事业是在对中外年鉴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年鉴发展历史缺乏系统认知和深刻自觉的背景下快速成长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极少数专业年鉴编纂对境外年鉴有所参考和借鉴外^①,地方综合年鉴可资借鉴、易于效仿的仅有《中国百科年鉴》等极少数现实样本。这种模仿与借鉴,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近40年来,在工具书观念主导下,年鉴编纂模式逐步固化,结构形态日趋雷同,思维方式变得简单乃至教条,一些研究者甚至对年鉴的形态内容和适用范围不加区别,盲目将政府主持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等同于普通的“便民手册”或“社会化工具书”,笼统强调其便览性、可读性、服务性以及指南作用,甚至提出地方综合年鉴要进行模块化编纂,这些认识,显然混淆了不同年鉴的性质和功能,抹杀了年鉴编纂的多样性特点,是对地方综合年鉴的误读。

从年鉴发展史看,百科年鉴就其收录的内容与其服务对象而言,仅仅是年鉴编纂的一种类型,而且是出现较晚的一种类型。1908年,美国多德公司首先出版《最新国际年鉴》,1913年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编纂出版《大英百科年鉴》,1923年美国百科全书公司推出《美国年刊》。这些年鉴,是鉴于百科全书出版周期较长,收录内容限于出版年份,“不免有不合时代的缺憾”,出发点是弥补百科全书的不足,即作为与百科全书配套的“补编”或“补本”形式出现的。^②在年鉴史上,年鉴并不全为百科全书的补本,绝大多数都以独立面貌出现,有各自的编纂目的和用途。早在1732年,富兰克林出版《穷理查年鉴》,起因是出版年鉴在当时是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由于销路很好,后来才决定把它作为“对那些几乎从不接触其它书籍的庶民百姓进行教育的恰当工具”。^③19世纪中后期,随着方法论的进步,作为度量研究的统计年鉴在世界各国开始大量出现。1864年,旨在为报纸的所有读者,即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英国文献中想要的统计资料的《英国政治家年鉴》,由弗雷德里克·马丁编辑,在伦敦创刊。该书扉页上,还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大家总说,人们通过数据统治着这个世界。而我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数据了解这个世界被统治得怎么样。”1949年《沙乡年鉴》问世,在身居贫瘠农场和简陋小木屋的利奥波德看来,“年鉴”意味着季节的变换,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以及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前两年上演的一部名叫《年鉴计划》的美国影片,导演狄恩·伊斯拉里特则赋予了“年鉴”穿越时空的意义。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编纂旨趣,人们对“年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年鉴所展现的形态、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所承载的内容自然也各不

① 如方厚枢在《中国出版改革发展20年的历史借鉴——〈中国出版年鉴〉20周年感言》一文中提到:“《中国出版年鉴》创刊前,我们所能参考的同类年鉴,只有台湾和日本出版的《出版年鉴》。”载《中国出版》2001年第2期。

② 王文莱:《百科全书和年鉴利用法》,《图书展望》1937年第2卷第4期。

③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杨颖译:《富兰克林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相同。

在西方,年鉴历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编纂形式通常比较简单、灵活,往往根据传播对象、收录内容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体例,即使属于同一类型、面向同一对象、采用相同方式编排的年鉴,结构体例也有所差异。《穷理查年鉴》与《老农夫年鉴》,《英国政治家年鉴》与《世界年鉴》,《不列颠百科年鉴》与《科学年鉴》,呈现的就是各自不同的风格和形态。近代中国,同样是西方人编纂的“通书”,旨在传教的《华英和合通书》与为居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编纂的《上海通书及杂记》,以及为宁波、镇海一带渔民编纂的《平安通书》,内容形式都大相径庭。清末民初,中国本土年鉴编纂绝大多数借鉴和采用的是教科书式或传统的分类编纂方法,间或也掺杂或融合了一些条目体成分,总的结构体例仍然体现出自身的文化特点。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世界年鉴》,分类上明显具有中国传统类书的特点。1931年,由南京时事月报社编辑,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李迪俊主编的《时事年刊》,在编述方法上取法文章体,将内容析为专题,分为上中下三编共13章,分门别类收入76位国内名流要人论文81篇,其中“外国之部”也借用了部分条目体作为点缀。针对这种条目式的罗列,当时就有人感叹:中欧与北欧各国“取普通年鉴式的记载”,按疆界、面积、人口、宪法、国会、政府各项进行排列,“未免使读者觉得枯燥无味”,且书中有许多小标题,内容未进行系统的归类叙述,“不免过于机械”。^①民国时期以收录统计资料为主体的“普通性(一般性)”年鉴,尽管从框架结构上看与今天的年鉴纲目有些近似,一些年鉴在每类表格之前还冠以“概说”,但从内容结构和编排方法分析,“纲”或“节目”均为统计数字的说明文字,许多“目”则为分列各表的标题,并非所谓的“条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样化的年鉴编纂形式出现了一个大转弯,地方综合年鉴无一例外将过去文章体改为整齐划一的条目体,直到今天,连贯的文章体内容和完整的信息资料人为被分割为碎片化的条目,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并不鲜见。这对于地方综合年鉴要求的内容的完整性、资料的全面性、记述的系统性来说,不能不说是体例和编纂方式上的一种缺陷。年鉴的表现形式取决于特定环境、特殊人群所需要呈现和反映的实际内容,是不是都应完全套用工具书特别是辞书条目编纂体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所以有研究者十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影响年鉴创新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工具书定位的掣肘”。^②

同样是综合性年鉴,可以是便览性的、知识性的,也可以是资料性的、学术性的;可以是流行读本,也可以是高文典册。民国时期,既有希望一般民众“于国家事务,瞭如指掌”的《中国年鉴》,适应一般大众“便利研究查考”需求的《世界知识年鉴》,以及“识字者都应购备”的《新国民年鉴》;也有为“政学各界及应试诸君”“以备参考”的《世界年鉴》,供“办理县政市政之参考”的《无锡年鉴》,“刊布国民政府暨各院部会以及各省政府之施政工作”的《国民政府年鉴》;既有旨在“整理保存现代史料”的《申报年鉴》,也有开宗明义为修

① 育生:《一部“年鉴式”的〈时事年刊〉》,《中国新书月报》1931年第1卷第12期。

② 曲宗生:《影响年鉴创新发展的两个根本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6年第2期。

志提供资料的《上海市年鉴》《桂林年鉴》。在近代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畅销的信息知识载体,主要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适应大众生活需要、容纳了大量日用知识的历本通书,以及清末以来应运而生的各式各样的“便览”“指南”“手册”“须知”“概览”等等,通书和各种指南、手册,在大众知识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民众中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日历’,而且还是生活中的‘百科全书’,甚至还是民众精神生活的‘指南’。”^①民国时期,一些“一般性年鉴”或“专门性年鉴”,开始注意到分众传播问题。1933年,铁道部在出版《铁道年鉴》的同时,“为适应人民对于铁路常识之需要起见”,编纂出版了袖珍本《铁道便览》,“期人民商旅,各手一册”。^②1946年,上海通志馆除复刊《上海市年鉴》外,应一般市民需要,出版了袖珍本《上海便览》。正因为近代以来大量流行于中国民间的通俗读物,与西方一些年鉴在便览性、实用性、可读性、普及性等方面的相似性,某种意义上承当了西方一些大众性年鉴的传播职能,以致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1846年、由西方传教士按照“Almanac”形式编纂的《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被郑振铎等人称为“中西合璧历书”,西方畅销了两百多年的《穷理查年鉴》《老农夫年鉴》,在当时中文报刊的介绍中使用的译名是《可怜理查的历书》和《农民宝典》。近几年来,许多地方在编纂综合年鉴之外,开始对年鉴资料适用范围进行定位和细分,尝试编辑出版各种“手册”“便览”,体现了年鉴分类传播的特点,不过,由于对目标受众的内在需求缺乏精准把握,内容资料不免流于宽泛,无形中成了地方综合年鉴的缩编本,在功效上大打折扣。当代地方综合年鉴,以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以政府主持编纂为特征,其现实意义在于地情参考、工作参阅、研究参用,核心价值在于“资政辅治”“堪存堪鉴”,不可能像流行书籍一样拥有广泛的读者。当然,我们不能说社会大众不需要喜闻乐见的年鉴读物,也不能说汇编便览、服务性信息毫无资讯价值,更不能说中国的年鉴就一定不能走进家庭,但在当下,地方综合年鉴在定位上如何坚持以史为鉴、恪守史家法度、注重史料价值,也许更有价值和意义。

三、年鉴内容的时代性问题

年鉴评价核心是内容价值评价。内容价值的选择,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方位。社会在变,年鉴评价的标准也应变化和调整,体现时代特点和当代价值。

1933年,《交通杂志》第1卷第11期“社论”栏中,发表了署名洪瑞涛的一篇读第一卷《铁道年鉴》后的感想,“希望此后编撰年鉴时,对于选材和编辑方面能有更大的改进”。文章分析了《铁道年鉴》在内容上存在两大缺点:第一,极重要的问题没有谈到,或仅简单的叙述,而不必要的文字反而充斥篇幅,登载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如职员录占40多页,各路各站距离表占75页,法规章制合同等多至430页。第二,缺乏分析的研究和编纂,1000多页的年鉴,编撰的只有305页,转录的多达971页,“而所谓编撰的文字,并且都是

① 葛兆光:《〈时宪通书〉的意味》,《读书》1997年第1期。

② 《铁道便览之编制》,《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3年第4期。

属于沿革或事实的叙述,缺乏进一步的深刻的分析与研究,读完了一本年鉴,只是看到了许许多多印在一起的资料,而缺少可供研究而有系统的编述!”^①文章发表正值中国“年鉴热”兴起之时,距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第一部年鉴《世界年鉴》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对年鉴编纂的批评,在当时并非《铁道年鉴》个例。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在选材和编辑方面就已显现出与特定的社会需求不完全合拍,与读者和用户之间有所脱节、不相适应的现象。

8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中所指的问题,在当今年鉴中并未改观。在一次文献应占若干、动态性信息和单一记事性条目应占多少,以及条目体思维、实用性定位等观念影响下,许多年鉴在选材和编辑上还在重复过去的老路。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与纸质媒体、电子媒体时代相比,信息无处不在,知识获取更加容易,政府信息的公开性、透明性大大增强。年鉴内容资料处在“信息夹缝”之中。一方面,有关各领域大事要闻的及时性资讯、热点新闻报道让人目不暇接,与大众工作、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信息变得随手可得。另一方面,各种智库机构不断涌现,大量以研究性、权威性、前瞻性著称的皮书已经形成年度化、系列化出版常态。年鉴以“信息载体”自誉的昔日光环逐渐褪去,号称权威性、资料性的优势正在减弱。在此背景之下,年鉴编纂和评价的重点,应当从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属性出发,着眼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去考量年鉴内容资料价值的大小。“全”不是照单全收,也不是面面俱到,更不是条目数量越多越好、动态性的信息和单一性的活动收录越具体越详尽越好,“全”是指有重点有选择的全,有史料价值的全,有广度和深度的全。适应时代需求,找准自身定位,体现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当代意义,年鉴才能显示其自身价值存在,不致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迷失乃至淹没自我。

任何年鉴编纂都是一定时代思想和观念的产物。当前,年鉴事业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编纂理念的转型升级。编纂理念是年鉴的灵魂,贯穿于年鉴编纂的全过程,决定年鉴的现实面貌,主导年鉴编纂发展的未来走向。编纂理念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时代感知,一种全局观念,一种科学、理性的客观态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当今年鉴编纂缺失的是史识观念的传承,对年鉴发展规律的认知脱离国情,自身功能定位出现偏差;从政府出版物的性质来看,年鉴编纂缺乏对执政施政理念的准确理解,对时代特征、地方特点的清醒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在设计思路和内容安排上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和经济社会新常态缺少足够的关照;从编纂责任主体来看,编述的身份严重缺位,年鉴成为各部门单位年度工作的简单汇集,应该收录什么、记述什么、反映什么,哪些素材不可或缺、哪些资料需要深入挖掘、哪些内容必须系统记述、哪些信息应当重点拓展,内容概念不清、资料取舍无度,缺乏专业眼光和权威判断。

^① 洪瑞涛:《读完第一卷铁道年鉴以后》,《交通杂志》1933年第1卷第11期。

年鉴的主要功能在于逐年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基本资料。近几年来,人们普遍发现,编纂、积累了二三十年的年鉴资料,在第二轮志书编修中并没有排上多少用场。究其原因,问题的关键并非出在年鉴的“志书化”上,地方综合年鉴定位于为修志服务与百科年鉴定位于为百科全书服务本质上并没有两样,恰恰是对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便览性、大众化工具书的过度解读,特别是碎片化记述和基本资料缺失所致。基本资料是构成年度现状最为本质性的内容,是支撑年鉴框架结构的基石。年复一年、连续不断的基本资料累积,是年鉴史识传承、致用功能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年鉴的基本资料包括基础数据的完整性、信息资料的综合性、素材选择的典型性、内容记述的权威性、文献信息的扩展性、数据资料的可比性、主题表现的专题性等各个方面。所谓基础数据的完整性,是指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年度发展变化的各项具体指标。与部门单位基本信息的概念不同,基础数据是反映事物年度变化的重要指标、把握事物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可以为分析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逐年可比的重要资料。信息资料的综合性,是指在占有大量素材基础上,通过归纳、综合、分析,呈现事物整体全貌或某一侧面的状况,反映出所记述事物的年度状况、动态、变化、特点、水平和趋势。综述性内容占比多少,是衡量一部年鉴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尺。充分挖掘典型素材是体现年鉴纪事特点的重要手段。素材选择的典型性,是指对于本地区、本行业、本领域具有年度代表性或时代意义的鲜活事例,通过翔实记述,给读者提供独特、鲜明、具体、生动的资料。内容记述的权威性,是指善于从各部门、各单位的来稿中发现有价值的资料线索,广泛收录政府部门的重要调研成果和课题研究成果,各种公开发布的年度公报、情况通报、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各类智库机构形成的监测报告、研究报告、蓝皮书等,提升年鉴编纂的专业水准,增强资料内容的可信度和公信力。文献信息的扩展性,是指在全面、深入反映年度发展变化的同时,通过延伸阅读、资料链接、相关报道、参考文献等多种形式,回溯历史事实,拓宽信息来源,提供资料线索,丰富表现内容。年鉴编纂的意义在于为当代和后世提供纵横可比的参考研究资料。数据资料的可比性,是指应注重年度事物发展变化的追踪性“报道”,尤其是要体现各行业、各领域数据资料的连续完整、口径统一,防止出现随意记述和前后资料数据不连贯、不吻合等现象。选题鲜明的专题图片、特载、专记等内容,是聚焦时事热点、深化内容主题、展现年度特色、增强年鉴表现力的有效形式。主题表现的专题性,是指围绕一个或多个年度重大主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典型图片或文字资料的有机组合,全景式、多方位地深度呈现年度史实。基本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年鉴方能彰显其得天独厚、人无我有的优势,在年度资料性文献中展现其独特的现实和历史价值。

四、年鉴体制的创新性问题

评价一部年鉴的质量高低,通常不外乎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装帧设计、编校质量等几个方面。但事实上,无论从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定位上讲,还是从高质量年鉴或者精品年鉴的典型性、示范性角度讲,这种常规层面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框架合理的年鉴往往是循

规蹈矩、趋同性较强的年鉴,强调条目编写更多的是注重记述要素的规范而非真正的内容资料价值,装帧设计大多看重的也仅仅是年鉴表面,编校质量合格只能说是达到合格图书的基本标准。一部高质量的年鉴特别是能够称之为精品的年鉴,应当主要体现在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设计上。年鉴精品之精,贵在主题表现别开生面,内容架构别具匠心,编纂手法别出心裁,整体设计别具一格。

从本质上讲,年鉴创新是由年度的变化性、时代的进步性、地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年鉴体制,固有常经,但一岁一辑,每岁间之事势容有差异,而此一地方与彼一地方,其书轨车文,也不尽符契,故年鉴之编制务变。此所谓‘变’,就时代言之,可谓为‘适应’;就材料之处理方法而言之,可谓为‘活泼’。凡目次先后,纪事详略与用材之取舍诸务,悉应因时因地制宜,俾年鉴每回皆能缘社会之变动进化,尽其所用”。^①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理念,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性质定位,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路径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和自身内涵。进入新时代,发展理念提升了,经济结构变化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年鉴编纂理应敏锐关注和积极回应。“法之所在,守其常不可不知其变,明其一不可不会其通”。^② 变是常态,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创新的目的在于使年鉴编纂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挖掘不同区域发展的自身特质,重构年鉴文献的独到价值,展现年鉴编纂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为年鉴事业的创新发展探索新路。

与特定的时代和需求相适应,不断创新年鉴的编纂内容和形式,是年鉴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1757年,《穷理查年鉴》在连续刊行25年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将历年年鉴中印在每页之间空白处所包含的来自于众多国家和各国时代的成语和格言汇集在一起,起名为《财富之路》,编排在1758年年鉴的卷首,受到当时相当多人的赞誉,而且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正是这一编纂内容和形式的改变,汇集道德训示、智慧箴言、行为准则的《穷理查年鉴》,成为全世界最热销的年历和经久不衰的致富经典。创办于1792年的美国《老农夫年鉴》,在进入20世纪后,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重新调整编辑定位,“从一个农业科技技术性质的专业性历史书转变为一个面向广泛大众的科普知识读物”。^③ 英国《政治家年鉴》的架构设计则伴随和反映了近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变化,在1864年创办之初,其结构由欧洲国家、不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两个部分组成,到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调整为英联邦国家、美利坚共和国和其它国家三个部分,1981—1982卷又改为国际组织、世界各国两个部分,其卷首收录的表格也由二战期间的国际联盟、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法院等内容,改为收录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大米、稻谷、高粱、糖、石油、能源、领海界限等统计比较资料。

中国年鉴的创始和发展,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立足自身国情不断探索创新的结果。在内容架构上,注重“以类纪事,以事编次”,因地制宜。1913年,被称为“吾国空前之作”的《世界年鉴》,“沿东西各国世界年鉴之例而作,惟于分类一端,则由同人自运匠心,

① 张绚:《略论年鉴之编订》,《安徽文献》1948年第4卷第5期。

② 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明法篇”,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③ 刘书峰:《简析美国〈老农夫年鉴〉的内容特色》,《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0期。

妥为支配,期得纲举目张之益,而收检察便利之功”。^① 1933年4月,《申报年鉴》出版发行。书中“工业”一项为“财政经济”子目之一,所占篇幅仅17页,“农业”篇幅更少,只有14页,而政治方面,不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均列为纲目,所占篇幅均较“农业”为多。当时刚从北大经济系毕业不久的千家驹,就从改良的角度指出:“假使译成西文,外人将疑中国今日,已经不是以农立国”,“本书之于取材编制,与其说是注意经济,毋宁说是偏重政治”,“这种分目在一个研究社会科学者看来,其缺点是一目可见的”。1934年续编的《申报年鉴》,吸收了上述建议,在编制的系统性上作了较大的改善,把“政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合并为“政治”,同时将“财政”与“经济”分设,“经济”中如工业、商业、金融、农业及农村都予以单独设置,而原来空洞的“社会”类目则完全取消,其中包含的子目分别归入各自应有的项目。千家驹认为,“这种改革,在经济生活占如此重要地位的今日,实为十分必要的事情”。^② 1944年,中断了近十年之久编纂的《广西年鉴》第三回,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地方政府公务统计纲目》、第一二回广西年鉴暨该省最近实际情况,“参酌拟定”编纂大纲,“有过去所无,而本回新列者,如铁路、航空、驿运诸类是也;有过去本简,共为一类,而今日发展,分列多类者,如电讯、公路、水利、边务、考铨、合作事业等类是也;有本为枝细问题,而在战时变动甚大、影响甚剧者,如金融、财政、物价等类是也”。^③ 可谓体现了广西实际和发展变化特点。在内容体例上,民国时期一些年鉴编纂自成创格,重视系统记述、体例创新。1931年《时事年刊》,鉴于“年鉴之书,多汇录零星断片之统计,详于现状的描写,静态的记录,而略于系统的记载,支离割碎,未具全豹。……因另创一格,于体裁侧重纵面与动态的叙述,凡记其事,必追溯其起因,详志其过程,预测其结果,源源本本,始末俱备”。^④ 1933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注重教育事实的纵向叙述,每一题材穷原竟委,各成体系。1935年《内政年鉴》编纂,要求“记载务取翔审,笔削不嫌谨严”。在编辑手法上,许多年鉴有开拓性的表现,如1913年《世界年鉴》、1928年《中国劳动年鉴》、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中国贸易年鉴》等分别注明资料来源,1933年《申报年鉴》收录了编辑所用的379种参考书报名称,1934、1935年《申报年鉴》列明“材料供给人和特约撰稿人”,1935年《内政年鉴》书前有总目、每篇之前有细目。可以说,年鉴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年鉴道路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

当代年鉴创新,是一个从观念到文本、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创新的概念,从选材到记述、从内容到形式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概念。就当下年鉴编纂而言,地方综合年鉴创新既涉及到如何认识和定位年鉴、如何正确把握年鉴发展规律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也面临亟待解决的思维定式化、编纂同质化、资料碎片化、内容总结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年鉴编纂要敏锐捕捉时代的变化,着眼于年鉴编纂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坚持创新引领,

① 1913年《世界年鉴》“例言”,《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年鉴专辑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12月。

② 参见:千家驹《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二年)》,《图书评论》1933年第1卷第12期;千家驹《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独立评论》1934年第102期。

③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广西年鉴》第三回上册“序二”,1948年出版,第3页。

④ 李迪俊主编:第一期《时事年刊(民国十九一二十年)》序二,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初版。

从提升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参考研究价值出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推进框架结构、内容记述、编纂手法的创新,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点、年度特征、地方特色的年鉴编纂新路子,努力打造出特色浓郁、内容翔实、风格鲜明的个性化年鉴。

五、结束语

如果从1823年“Almanac”一词第一次在《华英字典》出现算起,西方年鉴概念传入中国已有195年;从1875年《列国岁计政要》刊刻起,年鉴全本译介和引进已有143年;从1907年晚清政府组织编纂年鉴开始,政府主持编纂年鉴已有111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当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年鉴的发展才有坚实的根基、蓬勃的活力和正确的引领方向,中国特色的年鉴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冷晓玲

《新中国年鉴》

[日]中国研究所编,东京大修馆出版。本书为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工具书。创刊于1955年,原名《中国年鉴》,自1962年起改为《新中国年鉴》。书中文章均由日本各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专家撰写。分本册和别册。本册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中国的地理、人口、物产资源、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科技、文化设施、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医疗卫生、教育、体育、法令、决议、日中关系、政党、机构、人事等方面,并附有大量图表和照片。别册部分收录中国国家机构、团体一览表等方面的内容。

(摘编自《中华社会科学工具书辞典》)